

相际经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新思路^{*1}

何治民

(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湖南张家界 427000)

【摘要】:结合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状,本土民族经济学理论“相际经营”原理,审视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利弊得失,提出民族地区在制定和落实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等因素。对S村的实证调查发现,忽略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差异性,偏离相际经营方向,会导致“精准扶贫”效果不佳、扶贫成效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在当前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相际经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亲的的思路。

【关键词】:相际经营;民族地区;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8)02-0078-07

引言

发展是个永恒的主题,面对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局面,民族经济学家或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角度,来探讨“帮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的政策,提出了“现代化理论”、“涓滴效应”、“贫困文化”等理论;或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角度进行反思,提出“依附理论”、“自由经济学”等。这些经济学理论对于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状态和宏观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功不可没。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制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扶贫政策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从起初的西部开发模式到连片特困区扶贫模式,再到当前的“精准扶贫”模式的转变,扶贫政策的关注点从宏观转向微观,扶贫效果也越来越明显。但是,这些经济学理论在影响扶贫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时,特别是在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时,往往显示出其局限性,扶贫效果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或者扶贫成效不具备可持续性。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学理论总是倾向于单纯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因此,要做到扶贫政策的“精准”,除了经济要素外,还必须考虑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对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我国本土民族经济学理论“相际经营原理”,提出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时,需要充分关注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等对经济的影响。本文正是利用这一原理,来分析S村的扶贫政策的利弊得失,以期从民族经济学的视角,为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经济学扶贫理论及“相际经营”原理的提出

¹ 收稿日期:2017-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16ZDA15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一般项目“湘西地区传统生计与精准扶贫研究”(16C13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治民(1978—),男,湖南邵阳人,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讲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民族学。

(一) 经济学中扶贫理论评述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 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 积极寻求问题根源, 并尝试各种解决办法。在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界, 由于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 深受“社会进化论”思潮影响的学者们, 认为西方的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想方设法进入现代化社会, 才能摆脱贫困, 从而提出“现代化理论”^[1], 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2]。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 衍生出“涓滴效应”(Trickle Down)“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等理论。“涓滴效应”观点持有者希冀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 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 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从而解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困问题。“贫困文化”更是直接预设“穷人”有先入为主的假定预判, 认为他们缺乏知识和向上的动力, 学习能力也低于常人。“穷人”之所以穷, 是由于其所处的文化决定的^[3]。因此, 在制定反贫困政策时, 重点在于改变“穷人”的“落后的价值观”和“不良”的行为。

上述贫困和反贫困理论显然是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 以“先进文明”的姿态来看待“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贫困问题, 寻求反贫困的路径, 显然具有“文化霸权主义”的色彩。站在相反立场上的学者们, 提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 他们提出了“依附理论”和“自由经济学”等理论。“依附理论”用“中心—边缘”模式来解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边缘)的经济依附于北半球资本主义国家(中心或核心)的现象。因此, 要想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 唯一的出路在于改变这一结构^[4]。而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 把“自由”看成是发展的出发点和重要手段, 他认为, “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因此, 要实现反贫困的目标, 必须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做出社会选择”^[5]。

上述两种观点在认识贫困问题的成因和反贫困措施的选择上, 虽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但他们都是立足于全球经济格局, 从宏观层面来探讨贫困和反贫困理论, 在宏观层面把握世界经济非均衡性格局, 以及不同利益集团在反贫困问题上的不同诉求。然而, 在中观和微观的反贫困实践中, 以这些宏观的理论指导的反贫困实践, 往往取得的是不尽相同的结果。有些反贫困措施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有些反贫困措施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 却同时也埋藏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祸根。这些反贫困效果的差异, 宏观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并不能提供直接的解答。

(二) “相际经营”原理的提出及其内涵

我国民族经济学家杨庭硕先生在贵州省做了 30 多年的田野调查, 结合各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省的经营与开发, 检视了历代王朝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央政府对贵州省的开发实践活动, 提出了“相际经营原理”, 从中观的层面阐释了我国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制定的重要原则, 即跨“相”经营时, 除了经济因素外, 非经济因素也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杨先生的《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中, 他创造性地将制约跨民族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制约因素系统所规约下的社会及自然实体称为“相”。每一个“相”至少包括三个子系统, 即该民族特有的社会传统文化; 所处的特定生境; 所属的国家以及相应的法律政策、行政体制等等^[6]¹⁵。这三个子系统在每一个区域和族群中, 以不同的方式组合, 构建了互有区别的、内涵丰富的各式各样的“相”。同一个民族, 由于所处的生境不同, 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相”; 在相同的区域内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的族群, 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 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相”。

构成“相”的三个子系统, 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 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和方式也各不相同。生态环境是民族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虽然仰仗当代科学技术, 可以在短时间、小范围内有限地改变生态系统, 但科学技术所引起的改变, 在强大的生态系统面前, 毕竟还是很微小的, 而且这样的生态系统的改变可能会引起生态退变甚至引发生态灾变, 只要外界干扰消除, 生态系统会按照其自然规律恢复其原貌。

民族文化是人类社会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长期磨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延续的系统，是民族经济发展所能调动的最大的能量。民族文化按照其文化的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能动改造和利用，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之间呈现出“互动制衡”关系。民族文化的相对稳定性也意味着要想改变某一民族文化，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在“相”的三个子系统中，国家政体、法律和政策体系等因素最不稳定，经常会发生变化。但由于这一子系统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因此可以在短时段内调动各方力量，对民族经济在短时段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会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和民族文化造成牵连性的影响。“相”的三个子系统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其影响时段，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后果各不相同，正是这样不同的子系统，才造就了不同的“相”。

因此，在对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扶持和社会开发的“跨相经营”时，必须要考虑到“相”的三个子系统的实际情况。既要考虑民族地区所处的生态环境，也要考虑到当地民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综合考虑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体系等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进行“跨相经营”的经济开发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要根据不同的“相”来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措施。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指导思路——“精准扶贫”，恰好蕴含了“跨相经营”的这一重要原则。

二、S 村扶贫政策实践的反思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而且我国划定的十四个连片特困区，都属于产业结构较为落后，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还是我国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这样三种特性重合的区域，其贫困问题与农业、少数民族、生态环境问题自然地形成了密切的联系。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这一新的扶贫理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扶贫措施从之前的粗放的“撒胡椒面”式的扶贫方式转向“精准式”的扶贫，因而取得了较大的成效^[7]。然而，笔者在对 S 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有一些扶贫举措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其指导思想仍然沿袭粗放式的扶贫思路，与“精准扶贫”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不能取得预期的扶贫效果。而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有多种，以“相际经营”原理的视角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些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非经济因素(文化、生态环境等)对扶贫成效的影响显著。

(一) 贫困标准划分时忽略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S 村是湖南省一个全部由苗族乡民构成的普通村寨。在 S 村，进行贫困认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性，单纯地按照经济指标来认定是否贫困。在笔者调查过程中，S 村苗族老人杨某说，“我们并不觉得有多穷。我们村里的土地，种一年稻谷，可以满足全家一年半甚至两年的口粮。吃饭穿衣并不太发愁，就是用钱方面不太方便。”S 村村民的贫困观念和按照经济指标划分贫困线的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其间的原因在于，一个是按照农耕文明的视角，“丰衣足食”即为富裕^[8]；一个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工业文明的思路，把收入和支出等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衡量，从而确定一个可以度量的经济指标。这样的认知差异性，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差异性。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在《相际经营原理》一书中，记载了贵州瑶族“舍谷逐鹿”的现象。一只野鹿突然跑过荔波瑶山的田边，正在收庄稼的布努支瑶族人都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农活，全部加入围猎野鹿的行列。汉族及其他文化会怀疑：为什么瑶族人都放下现成的收获不要，反而全都不务正业地去追很难抓到手的野鹿？在瑶族看来，成熟的稻谷不会跑，而野兽一年只经过一次^{[6] 114}。外来文化对此不能理解，只因没有站在瑶族的文化视角去看待问题。其实，萨林斯在其《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萨林斯看来，“贫穷是文明发明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把渔猎社会描述成人类“最早的富足小康社会”，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群没有什么财产，但他们并不贫穷，贫穷既不是微不足道的物品数量，也不只是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贫穷是一种社会地位^[9]。在书中，萨林斯认为，贫困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贬低和误读，存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因而，从狩猎采集经济的视角看，没有过多财富的积累，也就不存在贫富之别了。当前，在 S 村贫困对象的认定过程中，工作队往往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民族文化中对贫困认识的差异性，而是按照其主观经验进行判断，或者单纯以货币经济收入来衡量贫富程度。这样就造成了在贫困对象识别问题上，扶贫工作队和当地老百姓的标准不一致，在确定扶贫对象时，老百姓意见较大。

（二）扶贫思路确定时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

因为有很多专家、学者与领导曾经到过 S 村调研，所以，周边乃至省内外的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每年到该村来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鉴于以上的情况，在选择扶贫项目时，自然而然地就把旅游产业作为当地扶贫开发的主导产业加以实施。然而，这一项目在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民族文化实际情况。S 村是典型的苗族村落，全村所有人口均为苗族，苗语也是村里的主要沟通语言，由于地处偏僻的山区，苗族的传统文化保持较为完整。在苗族的传统观念中，商业经营一直被看做是“副业”，从事商业活动被苗族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因此，旅游产业在该村推动之初，遭受了很大的阻力。在汉族地区，开发旅游，经营农家乐，提供住宿餐饮服务，这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汉族乡民也十分乐于从事这样的工作。在 S 村，观念却大为相反，当地苗族十分好客，可以为招待客人倾其所有，但他们却会因为向客人提供餐饮和住宿而收取费用感到难堪，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10]。后来，在村委的统一协调下，当地才陆续办起农家乐，统一收费，每人每顿饭 30 元，每人每晚住宿 30 元，这才使得农家乐慢慢有了发展。即便如此，该村的农家乐数量依然很少，只有七八家而已，提供住宿的农家乐更少，仅能提供有限的十余个床位。据笔者在该村的调查，所有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中，除了有一家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其余的经营者在农忙季节，或者在游客数量较少的时间内，依然会从事农耕生产。在他们的观念中，农业依然是“主业”，从事旅游业，只是会让他们“用钱更方便”而已。这一现象，在《相际经营原理》一书中也有类似的例证。1993 年，贵州望谟县修公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地的布依族同胞宁愿闲在家里，也不愿意去参加修筑公路的劳动，即使国家会有劳动力补贴。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去修筑公路时，他们的回答是，“自己家里有田有地，粮食多得吃不完，一家温饱无愁，何必为了几个小钱去干下等事，丢人现眼。”^{[6] 89}这两个例证，在汉族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地民族文化中，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民族文化间差异性带来的认知偏差。S 村的旅游业的开发，对当地经济带来的收益，不能和汉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收益同日而语，其间的文化差异性原因恐怕起了主要作用。

（三）扶贫项目的选择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充分利用

S 村是一个山多地少的村寨，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817 亩，而且大多分散各处，不成规模。按照现代集约农业的要求，这些耕地不能形成现代化农业。因此，为了在该村发展现代农业，扶贫小组在该县的另外一个乡镇流转了 1000 亩连片土地，用以规模种植猕猴桃。很显然，这一扶贫项目值得商榷，在不适宜的区域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S 村虽然不适合发展规模性农业，但该村所处的自然环境却适合发展林业经济。在 S 村，一共有 11000 多亩的山林地，这些山林地中，除了有 2100 多亩由集体所有的林场统一经营管理外，其余林地均为村民承包。在这些林地中，大多数以用材林为主，当地村民也积累了丰富的杉木种植技术。此外，野生的猕猴桃在林地里随处可见，品质很高，产量也很多。在不适合杉木种植的山林地，当地苗族村民种植着大量的油茶树和桐油树。在过去，这两项林副产品除了供给当地生活所需以外，也为当地苗族同胞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然而，当下 S 村的扶贫项目中，基本上没有针对该村丰富山林的项目开发，造成了虽然项目很多，但村民却无所事事局面，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调查中发现，人们之所以不敢轻易地利用 S 村的山林资源，源于不敢触碰“禁止滥砍滥伐”的政策。对于这样的情况，费孝通先生早有论及，“人文世界必须要依托自然世界那是不错的，但是只知道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不够的。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到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11]费老的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自然界若不能为人类服务，就没有意义。况且，在各民族长时间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磨合的过程中，早就积累了与自然界和平相处的文化，适度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会让生态系统退变而自身不会灭亡。

综上所述，当下扶贫政策和项目中，出现了种种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没有综合考虑到“跨相经营”时，各“相”的子系统之间的差异性。

三、相际经营原理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相际经营原理是民族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是在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总结和归纳出来的，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理论

概括。在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根据“相际经营”的相关理论，在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扶贫项目的选择上，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突出扶贫主体地位

《相际经营原理》中提及的贵州省三线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失效的实例，对当前“精准扶贫”工作有着理论借鉴意义。那就是，在扶贫实践中，扶贫工作者起到的只能是“帮扶”的作用，而不应该是“包办”的作用。脱贫对象才是扶贫工作的主体，在现实的扶贫实践中，往往把扶贫工作者当做主体，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扶贫项目的选择时，往往立足于扶贫工作者所处文化的需要，而较少考虑脱贫对象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所制定的扶贫政策和所选择的扶贫项目，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的色彩，所产生的扶贫效果不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扶贫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输血式扶贫”，也就是以扶贫工作者选择的方式来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扶贫方式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很容易接受和操作，也更容易产生政绩。但这样的“输血式扶贫”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尤其对扶贫对象而言，极易产生“等、靠、要”的消极态度，不能达到真正的扶贫效果。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也就是说，需要把扶贫对象当做脱贫致富的主体，政府、企业等扶贫工作者为真正的扶贫主体提供政策、知识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只有这样，突出扶贫主体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扶贫工作中的思路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困群体真正地从“要我脱贫”思想转变成“我要脱贫”思想。

（二）对于过时的经济政策应时常检视

根据“相际经营”原理，“相”的三个子系统中，国家法律和政策是最不稳定的子系统，但它对于经济的影响却不容小觑。任何一项法律和政策，都有其适应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法律和政策所产生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及时清理，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使扶贫政策流于形式。当前，我国已经开始着手开展这一项工作，一些不适应经济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政策和地方政府通行做法已经被废止。然而，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不容忽视，一些经济政策的后续影响力还在发挥作用，制约着贫困地区的发展思路。如我国南方分布广泛的木本油料作物油茶，曾经作为南方主要的食用油来源之一，近几十年来，其规模和产量衰退严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油茶林需要连片经营，而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大片的油茶林像耕地那样，被分割成小块林地。这样做的后果是，油茶林经营权被碎片化，不利于油茶林的经营与管理。加上其他经济果树林项目的影响，油茶林的承包者便放弃油茶而改种其他作物。像油茶林这一类需要大面积经营的项目，继续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明显不适合这类项目的本身发展需要，因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由企业来运作，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分割成小块的油茶林地连片成整体，以便于油茶项目的恢复和发展。

（三）扶贫项目的选择应该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内生动力

根据《相际经营原理》中“相”的子系统的多样性，只有生活在同“相”内的成员，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最了解，也最了解本民族的需要。只有将扶贫项目和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在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民族文化。S村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山林面积广，当地苗族同胞自古就有驯养野生动物的传统，野生蜜蜂的驯养在当地很常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当地苗族同胞会在房檐屋下，或者山崖石缝处放置木桶，甚至只需要将废弃的箩筐倒扣在空地上，不久后便会有野生蜜蜂前来筑巢酿蜜。接下来人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们只需要在冬季割蜜时，为蜜蜂保留少量的越冬蜂蜜，大多数的蜂蜜都可以作为苗族同胞的劳货。随着消费者对健康越来越关注，近些年来，S村这种“土蜂蜜”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价格也逐年提高，近两年的市场售价每公斤高达300元以上，且供不应求。当地苗族同胞意识到，这些原不起眼的“土货”，如今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于是，当地苗族同胞开始利用驯养野生蜜蜂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扩大了野生蜜蜂的养殖规模，成立了蜜蜂合作社，带动了该村村民的脱贫致富。

（四）扶贫项目的选择需要考虑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根据“相际经营”原理的理论体系，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的着生基础，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生态系统相对于文化和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经济政策受制于生态环境的规约，同时经济发展也会反作用于生态环境。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对经济发展和扶贫攻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需要把生态建设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考核体系中，而且把生态保护和生态治理作为重要的指标，去评估经济发展和扶贫的成效^[12]。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扶贫项目时，不能单单考虑经济因素，环境因素也应该被重视，甚至可以把环境因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精准扶贫”中的“因地制宜”，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的扶贫项目和手段，以达到可持续脱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S村生态优势在于拥有宽广的林地，利用这些资源，适度利用用材林，恢复发展经济林。选择如此的扶贫项目，不仅能让当地生态系统发挥其潜在的经济优势，同时也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真正实现“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目标。

结语

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解决的方法理应考虑多重因素。扶贫行动，从民族经济学的视角看，实质上是跨民族、跨地区、跨生态的经济活动，这就要求在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经济因素，同样需要考虑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以及政策法规等诸多非经济因素。民族经济学理论“相际经营”原理中，对跨“相”的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为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9—10.
- [2] 罗斯托. 经济成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 [M].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10.
- [3] 潘天舒. 发展人类学概论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78.
- [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M]. 尤来寅, 路爱国, 朱青浦, 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5.
- [5] 阿玛蒂亚·森著. 以自由看待发展 [M]. 任贇,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5.
- [6] 杨庭硕. 相际经营原理——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 [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5.
- [7] 谢俊贵. 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精准化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45—52.
- [8] 皇甫睿. 生态文明视角下苗族无盖藏文化的生态价值 [J]. 原生态民族化学刊, 2016(1): 2—8.
- [9] 马歇尔·萨林斯. 石器时代的经济学 [M]. 张经纬, 郑少雄, 张帆,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3.
- [10] 刘於清, 王银春. 论苗族传统慈善伦理及其当代价值——以武陵山区苗族为例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27—32.
- [11] 费孝通. 费孝通散文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531.

[12] 张绪清. 环境冲突与利益表达——乌蒙山矿区农民“日常抵抗”问题探析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62—70.